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魏 孝 文 帝

肖 黎

中华书局



魏孝文帝

卷一百一十五

十一

中国历史小丛书
魏 孝 文 帝
肖 素

*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1 印张 · 12 千字
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11,200 册
统一书号：11018·988 定价：0.10 元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魏 孝 文 帝

肖 黎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改革的历史背景 | 2 |
| 二、实行均田制 | 4 |
| 三、迁都洛阳 | 8 |
| 四、学习汉族文化 | 11 |
| 五、重视人才 | 15 |
| 提倡文化艺术 | 21 |
| 七、意节俭，约束权贵 | 23 |

古代，我国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，名叫鲜卑。它原来是一个部落，很早就游牧于今西拉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。最初依附于匈奴。东汉时，匈奴陷于分裂，逐渐衰落下去；鲜卑族代之而起，日益强大起来。

当时，鲜卑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，过着游牧生活。他们还没有法律、法庭和监狱，社会习俗简朴敦厚。当部族内部发生纠纷时，往往由四个长老共同判决。以后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才逐渐产生了私有制，部落酋长的权力也越来越大，鲜卑族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。

383年，著名的淝水之战爆发。在这次战争中，北方的强国前秦全军溃败，很快瓦解。这样，一度统一的北方又陷于分裂。在这前后，鲜卑族拓跋部也开始崛起。到386年拓跋珪继承王位以后，一方面治理内部，一方面向周围扩张，终于占领了黄河流域，成为北方的强国。398年，拓跋珪便自称皇帝，定都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，建立魏国。史称北魏，又称拓跋魏。

439年，魏太武帝拓跋焘依仗武力，先后灭掉北方各国，统一了北方，形成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。从这时起，到589年隋朝统一中国时止，在这分裂、动荡的一百

五十年间，先后有几十个封建皇帝，但是，真正有所作为并在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，要数魏孝文帝。魏孝文帝在执政期间（471—499）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，他吸取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。这些改革有利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，同时使北方各少数民族很快进入封建社会。所以，魏孝文帝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很有才干的政治家。

一、改革的历史背景

魏孝文帝拓跋宏是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，467年（献文帝皇兴元年）八月生于平城。469年（皇兴三年）六月，被立为皇太子。由于献文帝素来信仰佛教，厌恶政事，总想超脱世外，去颐神养性，所以，在471年（延兴元年）八月就把皇位让给还不足五岁的拓跋宏，自己作太上皇。五年以后，魏献文帝去世，死时只有二十三岁。

由于魏孝文帝的生母李夫人已经去世，魏孝文帝自幼就由祖母冯太后躬亲抚养，所以冯太后便以太皇太后的身份，临朝称制，国家大事都由冯太后裁决。

黄河流域是汉族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地区，也是汉族封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。拓跋部进入中原以后，

拓跋部统治者提倡开垦土地，鼓励农桑，实行计口受田等经济改革措施，使拓跋部由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，逐渐转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；同时又开始设置百官，分封公侯将军，重用汉族儒生，使国家机构日益完备。所有这些，都为魏孝文帝以后的改革创造了条件。

但是，鲜卑族毕竟比汉族落后，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如何统治比它先进得多的民族，这是摆在鲜卑族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。当时，鲜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，斗争激烈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。

鲜卑族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，掠夺人口、牲畜和财物，让俘虏进行奴隶般的劳动。统一北方以后，对各族人民的统治也非常残暴，租税众多，徭役繁重。他们强迫各族人民当步兵，在打仗时冲在前面，鲜卑族骑兵在后面督阵，稍有迟缓和怠慢，就会被后面的骑兵踏死。北魏统治者的残酷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，激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，仅在北魏建国后的一百年间，各地的起义和暴动就有七、八十次之多。在魏孝文帝统治时期，史书记载人民暴动的事件也有十几起。如471年，司马小君领导三千多人在平陵（治所在今山东历城东）暴动；472年，光州（治所在今山东掖县）人孙晏领导

一千多人暴动；473年，荣永安在相州（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）领导暴动；刘举也领导起义，自称皇帝；476年，冀州（治所在今河北冀县）人宋伏龙自称南平王，聚众暴动；490年，和尚司马惠御领导暴动等等。魏孝文帝面对人民的起义和暴动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他决心以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来改变野蛮落后的统治方式，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。

二、实行均田制

自西晋末年以来，我国北方经过了二百多年的战乱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。连年的战争和饥荒，田园荒芜，人口减半。于是，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。广大农民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，往往荫附于豪强之家，但豪强地主的征赋更加繁重，农民苦不堪言，纷纷流徙。这样，一方面使北魏政权直接控制的耕地和人口越来越少，另一方面又使大量荒地无人耕种，减少了北魏政权的财政收入，影响了社会秩序的安定。为了缓和社会矛盾，保证国家的财政来源，冯太后、魏孝文帝不顾地主豪强和守旧势力的反对，决心限制豪强大地主势力，并同他们争夺耕地和农民。485年十月，大臣李安世向魏孝文帝上书，提出均田建议。魏孝文帝采纳了这个意

见，并派大臣巡行州郡，会同各级地方官吏实行均田。

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：

一、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授给露田（没有种树的田称露田，实即荒田）四十亩，妇女二十亩。为了休耕，可根据具体情况，加倍或加两倍授给。露田不准随便买卖，身死及年满六十岁时要归还官府。同时，每户授给桑田二十亩，作为世业，传之子孙。在不宜种桑的地方，男子给麻田十亩，妇女五亩。此外，新定居的还有少量的宅田。

二、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，可以额外获得土地。奴婢受田的办法同一般农民相同。耕牛每头受露田三十亩，每户最多只限四头。

三、在人多地少的地方，允许农民迁徙，但不准逃避赋役。在人少地多的地方不准随便迁徙。

在实行均田制之前，北魏政权曾实行过计口授田的措施，均田制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它不但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，而且还肯定了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合法性。奴婢、耕牛可以授田的规定，又保护了豪强地主的利益。各级地方官吏，在任职期间得到的土地又远远超过普通农民，如刺史十五顷，太守十顷，虽然他们在离任时要如数移交，但也说明均田制是保护官吏特权的。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均田制

也有有利于农民的一面。它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农民，并肯定了农民对所占土地的使用权，使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，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。同时，允许无地农民迁往他乡，也有利于荒地的开发，有利于扩大国家的耕地面积。所以总的说来，均田制的实行，对我国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在均田制开始实行时，北魏还没有乡党制度，而是实行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，三五十家共立一个户籍，所以大地主隐匿农户的情况很多，妨碍着均田制的实行，不利于按户口分配土地。随着均田制的实行，整理户籍，改变民多隐冒的局面，便提上了日程。

486年（太和十年），大臣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，代替宗主督护制。三长制实际上就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实行已久的什伍制。即五家为一邻，五邻为一里，五里为一党；邻有邻长，里有里长，党有党长，合称三长。三长的主要责任是检查户口，征发徭役和兵役，征收赋税等。由于许多大臣本身就是隐匿农户的大地主，所以他们纷纷反对李冲的建议，冯太后和魏孝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，坚决采纳了李冲的建议。他们认为，实行三长制不仅可以保证均田制的实施，而且还可以把逃避租税的人口清查出来，所以很快设立了党、里、邻三长，确立了户籍制度。凡是担任三长的豪强地主，都

可以免除一至三人的兵役，有政绩的还可以得到提升，这就减少了实行三长制的阻力。

实行三长制，赋税平均，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好处。它跟均田制相辅相成。

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，又颁布了新租调制，规定一夫一妇每年交纳帛一匹，粟二石。这种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的新租调制，跟以大户为征收单位的旧租调制相比，既改变了租调负担轻重不均的情况，又限制了宗主对国家租调的侵吞，而且还可以把农户直接掌握到政府手中。据记载，在六世纪初，北魏政府已经掌握了五百多万户。

实行均田制、三长制以后，北方经济有了很大恢复。各族人民用辛勤劳动，开垦了大量的荒地，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。同时，耕作技术也有了提高。从北魏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，当时在耕垦、施肥、选种、浸种、收割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，种植果树、蔬菜的方法也都有很好的经验。养蚕、畜牧、酿造也发展起来了。过去北方广大地区荒无人烟的景象有所改变。农业的恢复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洛阳又出现了许多大的集市，政府又开始铸造五铢钱，北方又恢复了货币的使用。北方经济的发展，使人民的生活比原来战乱时期有了一定的改善。

三、迁都洛阳

在冯太后的培养教育下，魏孝文帝勤奋学习儒家经典著作，认真总结汉族封建帝王的丰富统治经验。486年（太和十年），在冯太后的指导下，魏孝文帝开始处理国家大事，起草文件。490年（太和十四年）冯太后病死，魏孝文帝于491年（太和十五年）亲自当政。他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。

北魏自建国以来就定都于平城，为什么要迁都洛阳呢？原因很多。

鲜卑人过去一直是过着游牧生活，以畜牧业为主要劳动。在进入黄河流域、统一北方以后，国家收入主要靠农业经济，靠剥削广大农民维持统治。平城地处边塞，气候寒冷，变化无常，风沙常起，农业生产条件较差，交通很不方便，稍有天灾就得四处逃荒，有时灾情严重，平城满街都躺着饿死的人。洛阳地处农业生产的中原地区，交通十分便利，一直是汉族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曾是东汉、魏晋的京城。平城是鲜卑贵族的老窝，保守势力很大，他们极力反对改革。所以迁都洛阳，既便于加强同汉族地主的联系，又可以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和影响，有利于巩固北魏的统治。

魏孝文帝知道，迁都是一件大事，必然遇到大臣们

的反对。于是他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，假称要调兵遣将，大举进攻南朝（南齐）。这时，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大臣信以为真，纷纷反对。魏孝文帝勃然大怒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社稷是我的社稷，任城王想出来挡驾吗？”拓跋澄也不示弱，说：“社稷虽归你所有，但我作为社稷之臣，对国家的危难，那能知而不言呢？”魏孝文帝见僵持不下，过了好久才说：“既然志趣不同，各说各的，也没有关系。”

退朝以后，魏孝文帝把拓跋澄召入宫廷，对他说：“今天谈的事，实在难办得很。我们的国家起自北方，建都平城。但是，平城是用武之地，不是搞文治的地方。现在要移风易俗，道路十分艰难。我这次行动，名义上是进攻南朝，实际上是想借机迁都中原。你以为如何呢？”拓跋澄这才领会了魏孝文帝的意图，认为东周和东汉正是在洛阳兴盛起来的，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，单凭武力是难以维持统治的。于是魏孝文帝又问：“北方人因循守旧，不想变革，怎么办？”拓跋澄说：“只有非常之人，才配作非常之事。你就下决心干吧，他们能怎么样？”魏孝文帝听了，高兴地跳起来，说：“任城，吾之子房也！”^①

① 子房，张良的字。张良曾赞助汉高祖刘邦迁都长安，所以魏孝文帝把任城王拓跋澄跟张良相比。

493年(太和十七年)六月，魏孝文帝下令在黄河架桥，以便渡师南进。九月，他不顾大臣的反对，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，进驻洛阳。到洛阳以后，他就去巡视洛阳的宫殿基址，只见荒毁殆尽，十分伤心。他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吟咏着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。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”^①的诗句，依依不舍地离去。接着又去参观洛河桥和汉魏石经。

那时，正值深秋季节，阴雨连绵，道路泥泞。经过长途跋涉，士卒十分劳累，随行大臣也叫苦不迭。魏孝文帝明明了解这些情况，却特意穿起战服，执鞭乘马，并命令军士立即开拔，进攻南朝。大臣们纷纷跪在魏孝文帝的马前，苦苦进谏，劝他不要南伐。魏孝文帝气愤地说：“讨伐南朝的大计早已确定，现在大军就要挥师南进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”大臣李冲说：“南伐的事，天下都不愿意，这是你一个人的主张。”魏孝文帝愤怒地说：“我正在经营天下，希望统一。而你们这些儒生，一再疑神疑鬼，阻挠实行。再这样下去，就照刑法办事。”说罢，就抛开李冲，策马而出。这时，安定王拓跋休等人又哭着上前进谏。于是，魏孝文帝对群臣说：“现在兴师动众，非同小可。如果不能成功，如何向后人交

① 见《诗经·国风·黍离》。

待？我们世代住在北方，现在想南迁中原；如果你们都不想南伐，那就索性把国都迁到这里。你们看行不行？”当时上自群臣，下至鲜卑军民，大都不愿意南迁，但是南迁总比打仗好，所以也只好表示同意。不再南伐的消息传出以后，群臣高呼万岁，迁都洛阳的事也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
接着，魏孝文帝派大臣李冲、穆亮等人营建洛都，派拓跋澄回平城，向留守平城的贵族传达迁都的决定，派将军于烈镇守平城，派安定王拓跋休去迎接眷属。494年（太和十八年）二月，魏孝文帝又颁发诏书，把迁都的事通知全国。由于平城的旧臣，留恋故土，不想南迁，魏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，跟他们讨论迁都的利弊，对他们一一进行说服。不久，即正式迁都洛阳。

四、学习汉族文化

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，为了把改革推向深入，决心改变鲜卑族的风俗习惯，进一步学习和采纳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。

有一次，魏孝文帝召集群臣说：“你们想不想让我们魏国也象周朝那样闻名史册，被人们千古传颂呢？”文武百官都表示同意。魏孝文帝又问：“是改变我们的

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，还是不必改变就可以达到呢？”魏孝文帝的弟弟、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：“只有改变，才能达到。”魏孝文帝又问：“你们愿不愿意让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治理国家？”拓跋禧说：“愿意。”于是魏孝文帝说：“好吧。那我们就迅速改变过去的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。你们必须服从命令，不准违抗。”接着，魏孝文帝便积极实行汉化政策。

494年(太和十八年)，魏孝文帝下令，禁止鲜卑贵族穿胡服，一律改穿汉族服装。原来鲜卑人过着游牧生活，穿短衣服适于马上生活，骑马射猎都很方便。现在他们已由塞北来到汉族聚居的中原，社会环境、生活方式都改变了，所以服装也应随着改变。而且穿上汉服，有利于减少民族的差异，消除民族隔阂。至少从衣着上看不出哪个是汉族统治者，哪个是鲜卑族统治者。

魏孝文帝在颁布政令的同时，还很注意检查执行情况。有一次，他外出打仗，回到洛阳，对大臣们说：“昨天我进城的时候，见有个妇女还戴着帽子，穿着夹领小袖的鲜卑服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们为什么不检查？”拓跋澄回答说：“现在洛阳城里还是穿鲜卑服的人少，穿汉服的人多。”魏孝文帝听了很不高兴，反问了一句说：“你还想让所有的人都穿鲜卑服吗？”随后，他把所有留守洛阳的官吏责备了一通，要求人人皆知，不许再

穿鲜卑服。

495年(太和十九年),魏孝文帝又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,一律改说汉话。过去,做官的汉人也得讲鲜卑语,军队中的号令一律用鲜卑语,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,还专门设置了“译令使”(翻译)。魏孝文帝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隔阂,下令在朝廷上不准讲鲜卑语。规定三十岁以上的官一时难改,讲鲜卑语的,可以不予处罚,但三十岁以下的官在朝廷上必须讲汉话,否则就要降职。后来又进一步规定,不许在朝廷上讲鲜卑语,谁违反规定就要撤职。许多鲜卑贵族对这个规定很不满意,但也没有办法,只好按规定执行,否则就要受处分。

从规定上看,提倡穿汉服,讲汉语,似乎只是对鲜卑贵族的要求,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。随着鲜卑族人跟汉族人交往的增多,讲汉话逐渐习以为常,所以他们都按这个规定办。据史书上记载,迁到洛阳的鲜卑人,不久就都忘记了鲜卑语。

496年(太和二十年),魏孝文帝又把鲜卑族的复姓改成单姓。他颁布的诏书说,北人谓土为拓,后为跋。北魏的祖先也是黄帝的子孙,在五行中属于土,土又是“黄中之色,万物之元也”,所以首先将拓跋氏改为元氏(所以拓跋宏又叫元宏),随后又将拔拔氏改为长孙氏,达奚氏改为奚氏,乙旃氏改为叔孙氏,丘穆陵氏改